

【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5986/j.1008-7192.2024.05.006

# 制度规范与行为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的实践逻辑

杨馨怡,王 程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资本行为框定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上。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同样具有追求增殖和扩张的普遍性行为规律,通过将资本运动限度界定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界限、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政治红线和社会道德层面的伦理底线内,进一步探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的现实路径。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首要前提下,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治理效能。利用制度规范与行为引导“双管齐下”,构建规范和约束资本行为的制度机制,引导资本实现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并使资本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引导下有序运行。

**关键词:**资本;规范;引导;健康有序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5-0035-09

##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为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资本同各类生产要素一起共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并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然而,资本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实践场域中并未消失,我国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sup>[1]211</sup>也暴露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资本无序扩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生态环境破坏等,甚至存在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任由资本任性发展必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平稳运行带来巨大挑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sup>[1]211-212</sup>简言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资本,必须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既要界定社会主义

的资本运动限度,又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优势并引导资本主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资本在阳光下最大化运行。

从理论层面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阐释了基于资本逻辑生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为一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剥削关系。资本作为资本家意志的化身,表现出对物质利益的狂热追求,持续地剥削工人,为其创造剩余价值,以扩大自身的权力积累。这种剥削关系一方面必然引发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也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与此同时,马克思并不否认资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并认为资本矛盾的最终克服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基础上,因而提出了“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观点,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利用资本马克思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深入分析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后,率先开创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先河。列宁指出,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

收稿日期:2024-0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ks139);安徽省高校思政能力提升项目(sztsh-2023-2-8);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创新项目(ACYC2022229)

作者简介:杨馨怡(1998-),女,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王 程(1981-),男,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mail:1260519873@qq.com

社会主义时,需要利用资本要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但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的矛盾性和局限性,需对资本加以控制,避免由利用资本转而被资本控制,防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段漫长且曲折的探索历程,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转型,资本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回避的重大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问题。他强调“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sup>[1]218</sup>,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sup>[1]219</sup>。

鉴于此,国内学界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的经典论断为前提,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其价值体现在敢于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用方法,“创造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sup>[2]</sup>。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的比较研究。有学者基于经济制度的视角进行对比,指出不同经济制度下资本的本质区别源于资本与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sup>[3]</sup>。还有学者基于资本主体性的视角展开对比,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是私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阶级特征鲜明;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以公有资本为主导形态,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本位,为全体人民服务<sup>[4]</sup>。

第二,在明确资本本质的基础上探讨资本的特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资本的特性“就是资本的本质(本性)存在的二重性或二重态”<sup>[5]</sup>。其中,资本的自然属性即资本一般,资本的社会属性即资本特殊,“资本的二重属性决定了资本行为的两面性”<sup>[6]</sup>。第二种观点将上述观点称之为“资本中性论”并予以否定,认为这种提法存在着逻辑错误,因其“把生产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已经是二重属性中的一重说成是具有二重性”,即不能将资本作为物的属性和生产关系的属性割裂看待<sup>[7]</sup>。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要结合具体经济运行和过程来分析经济现实中的资本,提出了从“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方法来切入研究资本的

特性和行为规律<sup>[8]</sup>。

第三,关于资本行为规律的研究。与资本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相对,资本的行为规律也存在普遍和特殊两种行为规律。不断追求价值增值的运动是资本行为规律的核心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的三个最突出的特性表现为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这是资本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的一般规定性<sup>[9]</sup>。资本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相结合会呈现出不同的行为规律,即资本的特殊行为规律。当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时,它呈现出疯狂扩张的无限逐利性;而当资本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时,它呈现出的是一种“合法参与社会分配并获得增值和发展的有限逐利性”<sup>[10]</sup>。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论公有制资本还是非公有制资本,都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现有研究从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视角对资本的特性及其行为规律展开了充分的学理性论述,并由此论证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必然性。然而,当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方面的实践操作互动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因此,本文旨在厘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所呈现出的逻辑悖论,并结合现有的研究基础,界定社会主义的资本运动限度,探寻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场域下健康有序发展的现实路径。

##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的发展悖论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不可否认,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11]36</sup>。然而,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力量,经由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愈发显现,资本使人和社都陷入其设计的陷阱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发展所呈现出的悖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悖论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资本表现为一个与生产过程无关、能够“自行增殖”的神秘物质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拜物教

之谜,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sup>[12]940</sup>。在此世界,资本家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看作是具有人格属性的资本和劳动,“劳动的生产力”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控制和剥削工人,实现了对整个生产过程和劳动产品的支配。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劳动者与他们的劳动条件所有权的分离,资本才可能在市场上购买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才转化为资本,资本关系才得以真正确立。从表面上看,工资似乎以平等的方式折抵了工人全部劳动所应得的报酬,剩余价值也只不过来源于资本在流通过程中以“低买高卖”的方式获取的增值额,一切都体现着平等的交换关系。然而,资本关系却是在物的掩盖下、在平等的买卖关系遮蔽下,剥削工人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一旦确立,它就必须始终维持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并且不断地扩大规模以再生产出这种分离,进而不断地加深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

## 2. 资本的增殖与劳动者的异化之间的悖论

马克思用“异化劳动”一词来描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由于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而沦为资本的附庸,劳动被迫降格为一种维持生命的手段。资本家唯利是图的行为动机,致使其对工人的内在感受和承受能力表示漠不关心,而把工人仅仅视作其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马克思指出,劳动本应是主体“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sup>[13]162</sup>。人通过劳动创造出的全部物质财富理应属于劳动者本人,人也应该越劳动越自由。然而,在现实的资本逻辑下,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就像控制工人的“牢笼”一般,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其被控制得越深,人本身越不自由。工人生产的产品作为凝结、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反过来支配并控制着活劳动。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变成了“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sup>[13]159</sup>。资本用尽一切办法最大化地获得增值,工资的降低、工作日的延长、更新技术和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者被迫沦为机器运转的“齿轮”,劳动变成了单调、重复且毫无创造

性的活动,阻碍了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 3. 资本扩张引发的“经济悖论”

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者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即“经济悖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追求价值增殖的动力驱使资本家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因而其必将“尽可能减少劳动者的消费以剥离出最大剩余价值”<sup>[14]</sup>,同时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产生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在资本扩张的进程中陷入“悖论性贫困”状态。“悖论性贫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一个明显的社会悖论——劳动与财富的分离,“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sup>[13]158</sup>。价值规律本应是市场经济中用以调节社会劳动分配和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但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扭曲为整个社会持续进行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因此,在以克制消费为前提的资本扩张进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由消费品迅猛增长而消费不足所导致的产品过剩现象。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资本的扩张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使得社会“一极是财富的积累”<sup>[15]743</sup>,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15]744</sup>。资本的这一发展悖论,不仅直接导致了社会消费不足,引发了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同时也削弱了资本增长的动力,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埋下了伏笔。

总体而言,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的剥削、逐利与扩张的内在逻辑,使得资本的任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陷入困境的泥潭。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以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也正是由于资本的这一内在否定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终极宿命。如此种种,都表明在引入资本要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服务时,若任由其按照资本逻辑自行其是,必然会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冲击社会主义的本质。

## 三、界定社会主义的资本运动限度

资本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目

的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殖为其唯一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15]</sup><sup>[87]</sup>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追求生产力高度发展是资本的经济使命,资本力求在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与统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运动必然要超越资本逻辑,诠释其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性逻辑。通过对资本运行的经济界限、政治红线以及伦理底线的三维追问与思考,由此澄明与“资本逻辑”相异的社会主义的资本运动限度。

### 1. 社会主义的资本其运行的“经济界限”

从基本制度来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运用制度规范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分别从所有制、收入分配以及调节方式三重维度,为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场域下的生成与发展划定了经济领域的运动限度。这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了彼此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优势。具体来说,社会主义的资本在基本经济制度内的运动限度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必须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其在总体上决定着社会的分配结构和调节方式,包含着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以及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sup>[16]</sup>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制形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重要结晶,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际,经历了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渐进式改革历程,最终形成了极具“中国化”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遵循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总体方向,在总体制度性层面上“调动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能动作用”<sup>[17]</sup>,使得资本在整体上得以统筹调度和优化配置,从而有效避免私人资本之间的碎片化竞争与资源浪费,是适合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

二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下的收入分配方式必须兼顾资本收益与劳动主体利益之间的平等性和公正性。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结构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下的利益实现方式,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制度动能。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导致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深刻对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始终确保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规消除资本‘奴役他人劳动’的现象的发生”<sup>[17]</sup>。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得劳动者变成了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占有并支配着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人。这种所有制结构又进一步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方式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同时发挥多种分配方式对劳动主体的激励作用。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而在利用资本要素做大“蛋糕”的同时,还必须将“蛋糕”分好,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在公平与效率层面体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sup>[18]</sup>。社会主义的资本对剩余劳动的积累直接公平公正地惠及广大劳动者能够激活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充分释放并催生出社会生产新的动能,不断地巩固劳动对资本的所有权与支配权。

三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还要求社会主义的资本必须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向度内运行。从有效市场的角度来看,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放大器”,有助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通过抑制私人资本无序扩张和过度竞争的冲动,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更加可持续、更具创新能力和更负社会责任感的方向发展,形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合力,并以此向生产力进行“力”传导,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从有为政府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还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必须在不直接干预市场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顶层设计”的功能,并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约束资本主体的行为,将有效配置资源同协调各方整体利益加以整

合,旨在实现人的发展最大化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均衡。

## 2. 社会主义的资本其发展的“政治红线”

社会主义的资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背景下运行的。虽然资本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内生性的联系,但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划定资本与政治之间的权力边界,谨防资本权力逾越社会主义的“政治红线”。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运动的行为规律为何呈现出不可调和的逻辑悖论,导致资本主义频陷危机,必须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向度来加以厘定。尽管马克思并未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给出直接论述,但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引发市场失衡,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背反关系。具体而言,“资本主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背后是政治制度与私有制的共谋”<sup>[19]</sup>。从制度性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旨在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为资本的自由发展扫清障碍;从权力结构来看,政府控制市场的力量与其所代表的资本力量是根本一致的,归根结底是资本在控制着政府与市场。在市场领域中,资本体现为资本家的人格化,而在政府领域中,资本则呈现出政治家的人格,主体双方的表面冲突或协作其最终目的不过是服从并服务于资本的逐利性。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质上仍受资本逻辑的主导。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宏观调控,但往往以事后调节的方式进行着,政府在其中充当着为经济危机“灭火”的消防员,并不能在源头上解决社会发展的“隐患”。

资本的权力并非是有限的。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引入资本要素时,必须重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既要引导资本合理、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又要谨防资本干预人民政治权力的纯洁性,实现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具体来说,社会主义的资本运行的政治限度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来加以限定。我国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历了由“基础性”到“决定性”的转变,而市场发挥这种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前提就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在受到制度保护的同时,更要受到严格的

约束。在制度的边界内,市场中的各类资本主体可以充分释放其经济活力,最大化地实现人民财富的积累;在制度的边界外,社会主义的市场杜绝任何资本主体间的不正当竞争以及资本侵蚀政治的行为。通过建立健全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限制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市场更加公平公正地配置各种资源,实现各类资本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转。

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唯一手段,还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前所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着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一致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主调节,还必须在不直接干预市场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引导经济有序健康发展。市场虽然具备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负面作用,如盲目性与滞后性、自然环境的恶化、人的精神的物质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因此,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必须介入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一方面充当立法者的角色,为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提供制度性保障,同时限制其无序扩张等行为;另一方面政府更是监督人和守法者。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既要监督并引导资本合理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倡导经济主体间的自由、公平竞争;同时政府更应主动约束自身行为,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杜绝资本与政治“联姻”以及任何资本干预国家政权的行为发生。

## 3. 社会主义的资本其运动的“伦理底线”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来限制和约束资本行为,更要在伦理道德观念上实现对资本主体的精神引领。伦理道德观念在本质上归属于意识形态领域,这就意味着其无法脱离人的主体性而孤立存在。人作为道德伦理的主体,在与他者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既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又反映着社会的整体道德规范。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13]550</sup>“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期的整个面貌”<sup>[13]551</sup>。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

动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但资本仍需吸纳劳动来为其创造可在市场兑现价值的产品,以此实现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因此资本仍存在压制劳动力的冲动。基于此,除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规范资本主体的行为之外,还必须“消除依附于‘资本拜物教’的基础和意念”<sup>[8]</sup>,发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对人内在精神的引领和约束。具体来说,社会主义的资本运行的伦理底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公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观念必须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价值导向。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我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所在,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行规律同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之间存在根本的异质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的最终归宿在于财富的积累,而社会主义的资本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强调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资本与人民的整体利益之间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因而资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定落在“人”身上。通过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主义资本发展的价值导向,不仅可以在生产环节保障劳动者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更有助于在社会主义的分配环节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加广泛而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二是将资本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边界内。资本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技场”中按照制度规范有序、健康地发展,这与资本主体的价值观念是否正确是正向相关的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在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体现着资本主体的个人意志,决定了其对于社会的体制机制、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等的认同感和执行力,因而持有资本的主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指向就决定了资本投入运行的方式。相较于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构成了规范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的整体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精神体现。因此,资本主体作为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现实的人”,必须在利用资本要素时主动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御资本力量对人价值观念的侵蚀,将价值伦理观念从思想层面落实到现实的行动之中。

三是资本的行为还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基因相契合,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精神的锻造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20]</sup><sup>18</sup>“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根脉,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许多宝贵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相比于西方国家以资本的积累与殖民扩张所开创的“非文明”样态的西方现代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经历了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向,彰显了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进文化方向。例如,以民为本、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思想,都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利益选择,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指向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同样可以成为约束资本主体行为的重要价值理念。

#### 四、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的现实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sup>[1]</sup><sup>211-212</sup>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我国现行制度背景下的资本兼具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两大资本形态,而无论是何种形态的资本都具有追求价值增值的普遍行为规律。因此,界定资本运动限度的目的是旨在探索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健康有序发展的现实路径,以使其在阳光下最大程度地促进经济增长。

##### 1.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归根结底离不开党的领导。“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保障”<sup>[21]</sup>,更是助推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器”。要在遵循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体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本质规定”<sup>[22]</sup>,将其落实到经济工作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资本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最为活跃的要素,总是渴望突破外部环境与其的束缚与管控,不断地追求在更广的领域和更宽松的市场环境中自

由流动。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其总是渴望流向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和地区,推动市场自发地分配各种资源。然而,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固有的局限性,若不适度地加以干预和引导而任其自由运行,则可能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顶层设计”功能,灵活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在“放”与“管”之间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间的良性互动。所谓“放”,并非是放任资本自由扩张、任意剥削剩余价值,而是要放宽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最大化运行的政策通道。通过打通资本运行的行业壁垒,尽可能地允许资本宽松地发挥微观活力,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所谓“管”,即政府应及时对扰乱市场秩序、违背市场竞争的行为予以有效管控,通过对资本行为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引导资本主体依法、有序参与经济活动。

## 2. 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作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直接通约为资本治理效能,制度和治理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关系。对资本的规范与监管应落实到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中,激活资本在制度轨道内实现人民财富的充分涌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资本治理效能。其一,把握资本行为规律,完善资本监管的制度机制。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导致资本可能最终走向垄断,因此,要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进行重点筛查和监管,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和惩戒力度,综合运用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等手段提高违约成本,强化震慑效果并形成惩戒效应。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要结合资本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强化资本治理的预见性与敏捷度,完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sup>[1]221</sup>。其二,用发展的眼光应对复杂多变的资本市场环境,建立协同联动的资本监管机制。随着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些互联网“巨头”企业凭借其充裕的资本和成熟的技术优势,导致市场容易出现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新型垄断现象。因此,传统的监管制度已然不再适应资本发展的新变化,需要健全线上线下的协同监管制度。运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监管预警系统,形成线上与线下、人力与智力的互补监管合力,并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完善资本在新兴领域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三,为资本发展设置科学“红绿灯”,划清资本发展红线。应通过法律法规“为资本设置准入的‘绿灯’制度、禁行的‘红灯’制度以及容错纠错的‘黄灯’转换制度”<sup>[23]</sup>。所谓“红灯”,是严厉禁止和防范资本肆意扩张、恣意操纵市场、控制民生、操控政治等恶性行为的发生,将资本运行逻辑可能带来的风险控制可在可控的区间内,实现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良性互动。所谓“黄灯”,是对资本扩张本性可能带来的社会潜在风险挑战实施“黄灯”预警,防止资本逻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所谓“绿灯”,是对资本要素合理有效地激活和利用,引导资本积极流向科技创新领域,鼓励其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加快流动速度、扩大流动范围、提高流动效率”<sup>[24]</sup>,推动资本市场在效率与公平、平稳有序与良性竞争之间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 3.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引导资本实现价值复归

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围绕人民利益建构彰显公平正义、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环境。其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语境中强化资本运行的人民性立场。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由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为价值旨向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持续发挥国民经济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和关键性领域内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充分激活和全面盘活公有资本在履行社会公共责任方面对非公有资本的引导与表率作用,抑制私人资本无序扩张和压制劳动力的冲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增强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二,资本实现语境中的人民获得感提升,体现为处理好资本发展与利益分配的关系。面对资本利用垄断等非法行为占有甚至“独享”劳动成果的现象,规避并控制由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需要完善更具效率与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充分释放资本



发展的正效应。促进形成从一次分配到二次分配、再到三次分配的收入分配体系,助推三次分配协同互补发力,根据资本的运行收益率不断调整利益分配结构。积极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确保劳动者享有的发展成果与经济发展效果同步,引导资本在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下健康有序发展。其三,注重加大民生领域的资本监管力度,避免资本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过度资本化和商业化。通过完善奖惩并举机制,支持引导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养老等关乎社会民生的行业和领域,确保资本投资质量与效益的统一,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优化资本为民服务的民生保障制度,着力为人的发展提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 4.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文化价值观念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

驾驭和引导资本在稳定健康的市场秩序内运行,不仅需强化对资本主体的外在行为约束,还需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资本逻辑的内核约束作用,涵养资本主体的精神信念。其一,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文化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国内外智慧文明成果,充分展现了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成为规范资本主体行为的科学指引。通过建立对资本的价值约束,引导资本人格化的主体压制自身的逐利冲动,在运用资本要素投身生产实践时,始终在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其二,塑造以诚信价值观为引领的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up>[1]220</sup>现代市场遵循契约精神来组织并关联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经济主体双方的契约关系,而诚信是一种不依赖外在条件约束就能够主动兑现诺言的精神品质和价值理念。通过加强对资本主体的诚信教育,引导其在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自觉树立诚信意识,主动将契约精神和守信观念落到实处,同时严惩失信行为、完善诚信褒奖机制,力求在全社会塑造一个充满诚信文化精神的资本运营环境。其三,在规范和引导资本行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对标”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制度规范。一方面,要在企业文化、行业规范、市场行为准则等规则体系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原则,督促、引导资本主体做到知行统一。另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评价和衡量资本人格化主体行为的价值标准。从良法善治的角度而言,将主流价值观纳入到规范资本主体行为的法治建设过程中,旨在使价值观念层面的“软性要求”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硬性规范”,以德法相济促进资本自身良性循环。

####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周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价值[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4): 128-145, 207.
- [3] 邱海平. 关于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几个理论问题[J]. 经济学动态, 2022(7): 3-15.
- [4] 金栋昌, 王宏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 认知转型、理论确证与应用方法论[J]. 经济纵横, 2021(7): 20-27.
- [5] 杨志.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资本特性的几点思考[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2(3): 1-10.
- [6] 陈晓枫, 李建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7-20(07).
- [7] 张俊山. 对“资本中性论”及其思想方法的分析[J]. 当代经济研究, 2022(7): 77-86.
- [8] 顾海良. 马克思“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理论与中国资本问题研究[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8): 4-16.
- [9] 胡怀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要素: 特性、作用和行为规律[J]. 经济学动态, 2022(9): 18-31.
- [10] 唐正东. 科学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J]. 群众, 2022(13): 32-33.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鲁品越, 骆祖望. 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3): 59-69, 206.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习近平.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



- 境界[J]. 求知, 2020(9): 4-7.
- [17] 鲁品越. 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思想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J]. 学术界, 2023(7): 20-30.
- [18] 程恩富, 董金明.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J]. 海派经济学, 2023(4): 232-233.
- [19] 王程. 规律与制度相统一: 社会主义的资本阐释原则[J]. 甘肃社会科学, 2023(1): 102-111.
- [2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1] 赵峰, 周慧珍.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J]. 学习与探索, 2021(6): 86-97.
- [22] 顾海良. 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1): 1-7, 107.
- [23] 朱珍.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3(3): 28-38.
- [24] 蔡之兵.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与政策逻辑[J]. 改革, 2022(6): 51-61.

##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and Behavioral Guidance: The Practical Logic of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YANG Xin-yi, WANG Che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00, China)

**Abstract:** To regulate and guide a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o frame the behavior of capital in a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stance. 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apit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 capital also has the universal law of conduct in pursuit of proliferation and expansion. By confining capital movements within the economic boundary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the political red line of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the ethical bottom line at the level of social morality,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realistic path of regulating and 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he effectiveness of capital governance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improved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ver economic work. With the “two-pronged” approach of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and behavioral guidance,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to regulate and restrict capital behavior would be constructed to guide capital to realize the value purport of putting the people above all else and enable capital to operate order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cultural values dominated by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capital; regulation; guide; healthy; orderly

【编辑 王思齐】